

碑刻上的历史

——上江清代裁撤夫局禁革夫马碑考释

◆李健

民,不支乌拉差役”。光绪九年,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下令裁撤夫局禁革夫马,在各地竖立夫马石碑。据迪庆州文物普查统计,目前迪庆境内此类碑刻仅存一块,2008年被列为香格里拉县文物保护单位。

上江夫马碑高146厘米,宽80厘米,碑首和碑身整块相连,无底座,青石质石料。通篇文字为遒劲有力的阳刻楷体字,笔法雄健,气势恢宏,结构严谨,排列均匀美观,刻工精良。碑首正上方有“执照”两个字,其正下方有“永垂不朽”4个字,字体长宽各8厘米。碑身碑文共计461字,分长宽各4厘米和长宽各2厘米两种字体,其中刻有人名45个。立碑时间为光绪十年(1884年),碑文部分字迹模糊,但大部分还可清晰辨认。

碑文内容记载: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处理云贵总督部堂福建巡抚部院行轺车都尉岑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御史云南巡抚部院杜为通飭晓喻事照得滇省夫马最为民害令本部堂院飭司局别筹因款厘定章程所有学院考试各郡及查实提案委员一切要差夫马均由局照章核计往返程站给发自行雇脚此外提□司道以及地方文武各衙门派用夫马自光绪九年正月一日起一概裁革各州县不准再设夫马局除会奏通飭永远遵行外合行晓谕为此仰前省军民人等知悉此如有地方文武衙门仍前派用民间夫马上豪劣绅借端设局苛派一经委员查出或被控等情即从严参办治罪尔等其各安生业尽力耕田亩毋负本部堂院体念民依之至意具各禀送毋违特谕右仰通知布政使司马示通省夫马奏明禁革所有夫马一律裁撤尚有□□擅行摊派直接追究治罪不贷光绪十年仲春之月,□旦建立绅士:陈大方 □珍 和福泰老民:萧保和 尹培初 和继善 唐佩吟 陈大才 和□史等。

清政府为征兵防剿设立夫马局,最早在《梁山历史碑刻注译》文献记载,“同治初年,四川省与邻省军务紧急,各处征兵防剿,地方供给兵差,始创夫马局”。同治初年,正值云南掀起回民反抗清朝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云南各地夫马局是清朝政府镇压回民起义战事紧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提供军饷和人马临时性机构。岑毓英在奏章提到“只以军务吃紧,饷需奇巧,故所用夫役”。夫马局由地方官委绅设局,向百姓特别征收夫马徭役,原为万不得已之举,待军务肃清后撤销。

清朝政府设立夫马局,最初为战事紧急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提供军饷和人马临时性机构。但战事平息后,却没有如期撤除,地方各府、厅、州、县借夫马局名目任意苛派夫差马,层层盘剥,民不聊生。当时,云南各府、厅、州、县的官员平时肩舆、旗锣、伞扇,以至看堂、看门、守监、押犯,下至扫地、放牧皆用夫马。此外,新旧官员赴任、去任,用夫更多。派夫之外,又加派“马”。平时则有跟班马、听差马,办差则有送差马,有时甚至既派夫马,又再征收夫马费,沿途索要,任意索取。加之经营夫马的地方官员暗地加派,剥削百姓,中饱私囊,压得百姓苟延残喘,史称夫马之害。

岑毓英上奏朝廷“既征徭役,又派夫马,大非朝廷恤民之意”,如果不完全裁革夫马,就无法纾缓民困,百姓的气节也难以恢复,边疆的安定也将遥遥无期。

光绪八年(1882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杜瑞请奏朝廷,将云南通省夫马,自光绪九年正月一日起(1883年2月),永远裁革。以后督抚、学政、提督、司道各要差,均由善后局照章酌给夫价,各府、厅、州、县有紧要差使,俱照章给价,不准苛派地方,违者从严办。朝廷批准了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杜瑞的请奏,夫马局正式得以裁撤,夫马徭役从此得以取消。夫马局撤销后,清政府在各地树立了許多夫马石碑,云南边地也逐渐“积弊渐除,民力渐裕”。

裁撤夫马局禁革夫马徭役的改革,铲除了地方贪官污吏产生腐败的土壤,堵住了企图乱摊派和乱征收的途径,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稳定了社会秩序,对云南边疆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上江裁撤夫局禁革夫马碑见证了这段鲜活的历史。

上江夫马碑解放前一直摆放在福库村庙里,文革破“四旧”时村庙被毁,夫马碑被遗弃在福库大河边,一度被作为村妇洗衣板使用,后来又当做过河桥墩,碑上雕刻的文字受到严重损毁,2008年被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这块迪庆州唯一仅存的夫马碑被当做公路护墙石砌在公路挡墙上。风雨飘零,一个多世纪过去,上江夫马碑依旧在无声诉说清代夫马裁撤、减轻百姓徭役的历史往事。



上江裁撤夫局禁革夫马碑

香格里拉市上江乡福库村公路挡墙护坡上,镶嵌着一块清代光绪年间的珍贵碑刻,这是目前迪庆州境内仅存的一块清代裁撤夫局禁革夫马碑刻。这块碑刻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活化石,它以其特有的“原始性、民间性、鲜活性”的优点,补正了地方文献中记载清代裁撤夫马局史料的不足,是研究迪庆清代夫马徭役历史的宝贵素材,是清政府免除边疆民族地区夫马徭役最直接的历史见证。

清代裁撤夫局禁革夫马碑是云贵总督岑毓英(1829年至1889年)、云南巡抚杜瑞联(1831年至1891年)在光绪十年裁撤全省夫马局的告示,是禁止地方派用夫马徭役的政令,由地方乡绅篆刻,立于人口集中的交通要道,以告知百姓。清代裁撤夫局,禁革夫马是清朝中央政府减少边疆民族地区乱摊派和乱征收、杜绝地方官员腐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社会改革,上江裁撤夫局禁革夫马碑(以下简称上江夫马碑)成为清代这一社会政治改革的重要实物见证。

上江夫马碑立于香格里拉市上江乡福库村福库三组上江公路右侧路沿处,碑名为后人所加,地理坐标N:99° 64' ,S:27° 38' ,海拔1886米。据《中甸县志》记载:“光绪九年(1883)五月十九日云贵总督岑毓英颁发禁革夫马,裁撤夫局布告到甸,示谕汉藏任何官

国学大师的文史情怀

——读钱穆新书《中国通史》

△张光荪

钱穆先生是一代通儒,尤以治史闻名,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史学地位毋庸置疑。而现行中国通史版本中,以一人之力,首尾贯通,且又自成体系者,钱穆《国史大纲》堪为个中翘楚。我现在正读的这本《中国通史》(天地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版),由钱穆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完成,书中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史情怀。

这本《中国通史》,有着钱穆的“自作主张”,不同于官方手册编纂,也不同于“戏说”式民间写史。它以“航拍”的视角审视中华民族文明,有着独一无二的钱穆“调性”,从字里行间能领略钱穆当时授课魔法般的吸引力。叶龙在序言中描述:“宾四师撰《国史大纲》之时,亦另编国史读本,供学生课堂外之阅读,读本凡得百万字……此书之于《国史大纲》,两者详略轻重,各有互补。”尽管本书并不是钱穆直接写出,而是由他的学生叶龙记录整理,但是书中讲述的内容还是大师所说,也完全得到了钱穆大师的真谛。

钱穆先生是深入人心的讲史者,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听讲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穆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当时,钱穆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尔后,钱穆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所幸,这第三次讲授底本,终被一个叫叶龙的学生给记录下来。

钱穆先生讲历史,好讲述史料,而不是直接引证。书里囊括了很多小“故事”,名人轶事、野史趣闻,不一而足;嬉笑怒骂,任性敢言,有着民间写史派的平易近人和泼辣风采。他说,讲道德的人亦可用手段,诸葛亮曾有借东风和空城计。周公用手段来完成道德的目的。周朝第一次封建是周武王,第二次封建是周公分封宗戚并兴灭国继绝世,于是周朝以德治天下,有八百年历史。所以说,“中国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历史。读西洋史,读罗马史并不好,没有味道,最好读周朝的历史。”读钱穆先生课堂上的即兴发挥,犹如神来之笔,令人陶醉。

钱穆先生做学问的一贯主张是: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所以,每逢遇着时代大转变,而大家对某一类重要创作在意见上有重大分歧时,钱穆必定会作出明确的决断,并提出有力论证,使人信服。比如,他讲唐代之武功所以强大,其原因为:(一)因敌人并不强大,突厥之政治组织较匈奴松弛,故不可怕。(二)唐自南北朝以来,民族血统加入新的力量,五胡乱华后混入外族血统,成为新的民族。读之,感到钱穆的讲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生动好懂、符合大众口味的。但相较民间写史而言,钱穆通史无疑更专业。

钱穆先生讲史以“温情与敬意”著名,这部《中国通史》,依然满怀温情和敬意。它或许不是最完备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情怀的中国史。它以“守旧”为支点,打开中西文化差异的缺口。他比较中西文化,说秦汉文化犹如教室四周悬挂的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像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他讲周武王灭商后,因年老而两年后崩。周武王并非要灭商,但商纣的政治太坏,乃是吊民伐罪,特来慰问民众,讨伐商朝。“此乃三千年前之事,如系欧洲人,便不会如此,可见中国民族是有文化的。英国人不够朋友,而是帝国主义,不肯归还香港。”

而今,放眼“中国通史”林林总总,戏说之有之,过度个人化解读有之。钱穆版《中国通史》这一尘封多年的通史经典,必定为万象纷乱的读史热潮注入一股清流。钱穆先生高呼:“学术不熄,则民族不亡。”受这句话的启发,我认为倘若国人能够潜心挖掘和发扬国魂,即心存温情与敬意回首过去,更怀着信心与梦想展望未来,则国史不仅能免于断绝,更可以在不远的将来描绘出又一个辉煌的高峰!



张永鸿摄

上汽大众丽江锦锐迪庆专营店

德系高端中型SUV途观L已到 7座大型SUV途昂全面接受预定



上汽大众 SAIC VOLKSWAGEN

地址: 香格里拉康珠大道康珠酒店对面东风小康旁 电话: 18314557220 杨顾问

